

刘氏嘉业堂刻书印售考(1931—1936)

——以嘉业堂营业书目三种为中心

袁 静

内容摘要:根据目前已知存世的三种嘉业堂营业书目以及报刊、信札等材料,可考察嘉业堂 1931—1936 年间的刊印与销售情况。这些售书活动是刘承幹在经济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书,缓解经济压力的举措。三种书目应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之手,而嘉业堂所刻各丛书系陆续竣工,因此各书目在内容与体例上存在显著差异。营业书目编行后,刘承幹采取免费分发书目、在报纸上登载特价以及预约广告等营销手段,通过邮购与门市发售图书,并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但书款回收困难。在实际销售中,刘承幹倾向于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若遇熟人购书或介绍购书,金额较少者则转为奉赠。对嘉业堂营业书目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销售情况,也是目录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刘承幹 嘉业堂 营业书目 民国刻书史 图书销售

刘承幹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私人藏书家,收藏宏富,驰誉海内;又不惜重金,刊刻书籍约二百种,三千余卷,“参与人员之多,刻工地域之广,刻书规模之大,可谓极一时之盛”^①。嘉业堂刻书以其雕梓之精,数量之大,成为近现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绝唱。以往对刘氏的研究,多利用信札、日记、书目等文献,围绕刘承幹的交游及其嘉业堂藏书、刻书等活动开展,

^①陈谊:《嘉业堂刻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吴格指导),2009 年,中文摘要第 1 页。

成果斐然^①；但对刊刻之后付印销售的情况则缺少关注。

近年来,陈郑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两册《嘉业堂刊印书目》对其售书情况开展研究,分析鲁迅赴嘉业堂买书被拒一事的来龙去脉,认为鲁迅购书被拒的深层原因是刘承幹经济趋紧,刻书事业急剧收缩以致无书可卖^②。可惜作者未介绍该书目的具体信息。实际上,目前可查国图藏《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有三种,分别是辛未七月订版(索书号:148035、144339;微缩胶卷号:MGTS/086153,下文简称“1931年版”)、乙亥重订版(微缩胶卷号:MGTS/086031,下文简称“1935年版”)、丙子重印版(索书号:144334,下文简称“1936年版”)^③。本文拟从这三种书目入手,探讨书目编行的背景,比较分析目前存世的三种营业目录,并结合当时的报纸,上海图书馆藏《求恕斋信稿》^④等资料,考察嘉业堂在1931—1936年图书刊行销售的具体情况。

一、《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之背景

刘承幹在《嘉业藏书楼记》中曾述刻书缘起说:

因念昔贤所著,见于诸家著录而亡佚者盖多,其幸而仅存者,不可无以永其传。会购得朱氏《结一庐丛书》版,益以所自刻者,汇为

①除上引陈谊的专门研究之外还有:李性忠《刘承干与嘉业堂》(文物出版社,1994年),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六章,黄建国《嘉业堂藏书楼的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93页),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七章第二节,应长兴、李性忠主编《嘉业堂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陈炬弘《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1894~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章第四节,刘洪权《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七章等。

②陈郑:《从〈嘉业堂刊印书目〉看鲁迅购买嘉业堂刻书》,《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7—23页。

③前两种书目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读者云门户”网页上(<http://read.nlc.cn/user/index>)检索并阅览。丙子重印版书目则影印收录在刘洪权编《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8册,经笔者与原书核实确认,影印版漏印原书的最后一页。

④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862675-768)。此书可在上图官网在线阅读,以下引用页码皆为网站公布书影的页码。

《嘉业丛编》，此为校刊丛书之始。^①

自1912年购得结一庐书板开始刻书，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刘承幹还在零星刊刻《刘氏家谱》^②。彼时刻书除雕版费用外，还需额外资金购置纸张，支付刷印装订工费。因此，板片刻成后，如有流通发售之需，交由书坊印卖，最为省便。若自印自售，则须承担全部印制成本并自行开拓销售渠道。

1930年，刘承幹在给傅增湘的信中透露了他有自印售书的打算：

近有友人力劝自印，虽计费甚巨，而券售预约，不致虚糜印费，将来北地诸公印订葺工，亦以观厥成功为快，诸公既免筹募之劳，而敝书楼亦可借以补助，一举而两得之……再侄自印之举，其中故有原因：一缘友人怂恿，一缘星伯原稿。当时仪征刘谦甫年丈为侄编辑，诸多割补，此刻难以归原，自印则无须贴割，是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行也。合并陈明，幸于诸公前婉达之。^③

刘承幹谋划自印售书，其中故有原因，即友人怂恿、徐松《宋会要》事件两端。刘承幹与缪荃孙、董康、徐乃昌、陈绳夫等藏书家、刻书家交往密切，每有新刻，即分贻同好。这些声气相通的刻书家群体彼此互为图书代销渠道。以缪荃孙为例，傅增湘、盛宣怀、罗振玉、董康等在刊书后都曾拜托缪氏帮忙销售^④。若印量较大，还可委托书坊、书店代销寄售。如上海扫叶山房、西泠印社、食旧廛、蟬隐庐等书店代销缪氏刻书的记录屡见于《艺风老人日记》中^⑤。因此，友人力劝刘承幹自印自售，实为当时通行做法。另一件促使刘承幹决心自印发售的关键事件是《宋会要》原稿遭篡改一事。该书由徐松辑自《永乐大典》，刘承幹曾以重金购归，因原稿部

①缪荃孙等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06页。

②刘承幹：《致施韵秋》，《求恕斋信稿·丁丑（1937年）》，第7649页。落款署“八月一日”。本文引用时间信息均据原文，行文中使用数字标注阳历日期。

③刘承幹：《复傅沅叔》，《求恕斋信稿·庚午（1930年）》，第5718页。题下署“五月三日即五月卅号”。

④钱伯城、郭群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5、805、1249页。茹静整理：《董康、刘承幹致缪荃孙尺牍》，《历史文献》第二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6页。

⑤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21、321、381页。

类不明,先后杂厕,于是延请刘富曾、费有容重加厘订,不料刘富曾对原稿多有删补,不复原来面目,誊清本又与稿本不相吻合,纠纷亦自此起^①。此事使刘承幹深感委托他人不可靠,不放心印售一事假以他人之手,“是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行也”。

此封信函还透露出促使刘承幹决定自行印售的关键因素,即经济考量:他计划通过预约发售回笼资金,并以售书盈余贴补藏书楼运营经费。1930年代,刘承幹经济状况日渐窘迫。1931年第一次正式印售自家刊刻书籍,他便宣称初衷是将售书利润用作嘉业藏书楼的日常经费补助,“拙刻付印,均属书楼,盖借所售之费为书楼经费补助也”^②。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刘承幹持有股份的商业受战事影响而停顿,“侄处自战事猝发,商业受损,金融受挤,为历来所未有。房租所收,只十之二三,自阳历正月至四月底,已届四月,房客一味延宕,要求免租,亦无可理喻。而支出方面,则捐税重叠,善举捐款,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钱业又以时局关系停止往来,而侄所开典铺,现届盲蚕之际,正欲添本,无米之炊,巧妇难为”^③。后又因家庭纠纷损失近百万元,他为节省开支,于1934年底迁居苏州,将上海爱文义路住宅抵押三十五万元。在此情形下,施韵秋向刘承幹提议第二次印售书籍,由他主持筹划。1935年2月27日,刘承幹在《致培余弟》函中透露,他“现在负债之数尚达一百七十万,而尊德里空闲之屋无人过问。今年又自动减租,而典业亦远不逮前,则收入方面势必大减,家用虽力事撙节,然际此百物翔贵之时,亦殊不易”^④。在经济日渐支绌情况下,刘承幹仍坚持印行,其1934—1935年的印售活动,显然主要为了营利。

此外,促使刘承幹转向自家销售所刊刻图书的外缘还有以下三点:

(一)索者纷纷,难以应命

刘承幹刻书并不为牟利,他为人慷慨,刻印书籍往往用于馈赠亲友或

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②刘承幹:《致许西畴》,《求恕斋信稿·辛未(1931年)》,第6035页。题下署“二月十日即三月廿八号”。

③刘承幹:《致章一山》,《求恕斋信稿·壬申(1932年)》,第6523页。落款署“五月八号即四月初三日”。

④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1935年)》,第7228页。落款署“二月廿七号即正月廿四日”。

文化机构。“窃不自揆,思欲借此以保存国粹、发扬文化,故国内外公私各图书馆及研究国学之士邮书来索,罔勿捐助巨帙,以资流通。”^①《嘉业老人八十自序》亦云:“综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凡海内外图书馆,无不举以馈遗。”^②南浔嘉业堂保存的赠送嘉业堂自印书的名录显示,1915—1919年间,嘉业堂出赠自刻书共计4882部,受赠者达207人^③。

嘉业堂所刻书尤其是大部头丛书,并非一次性刊刻齐全,而是次第完成,刘承幹则随刊随印,随时分赠诸友。如1931年2月24日《致曹纘衡》函云:

《雪桥诗话》第二集及余集前经奉赠,兹再补奉三集十二卷,以成完帙。^④

又,1931年南洋中学设立图书馆,校长王培孙向刘氏函索赠书,刘承幹回复到:

近复辟书馆,以便探讨,此后东箭南金、人才辈出,可以预券……承索书刊,敝处二十年来剞劂校雠,区区之志,亦欲流通古籍,公诸艺林,予以商量旧学,阐发新知。既荷嚶鸣之求,敢为枕秘之固。兹再检出十种,借备插架。^⑤

刘承幹这种慷慨分赠的行为引得诸多名士遗老慕名来信索书,而己得赠书的友人又因新书渐次刊成,闻讯索要。获得赠书的各大图书馆也因为刘承幹赠书时随刊随赠,往往不成丛书,故而函索纷至,以求配齐。如,1932年1月7日《致孙虞臣》函云:

承询史部书,拙刊虽有多种,而大都均无存书,意兴阑珊,目前亦未必续印。日后如续印出书,当再奉赠插架。^⑥

5月10日,再致书云:

承索拙刊,兹特检奉《瞿木夫年谱》《朴学斋笔记》《邠州石室录》《黄忠端甲申日记》《言旧录》《闲渔闲闲录》《明史例案》七种,借

①刘承幹:《致蔡子民》,《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343页。落款署“十一月廿九日即十月二十日”。

②缪荃孙等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第1410页。

③应长兴、李性忠主编:《嘉业堂志》,第59页。

④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76页。落款署“二月二十四日即正月初八日”。

⑤刘承幹:《复王培孙、钱新之》,《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103页。落款署“五月十八日即四月初二日”。

⑥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405页。落款署“一月七日即十一月三十日”。

备插架,其余三种已无存书,尚祈谅解。^①

20世纪30年代,刘承幹的经济问题日渐凸显,加上纸价渐昂,印工日贵,续印的经费难以支撑,而索者纷如,自然苦无以应。刘承幹在1935年5月17日的《致蔡奎农》函中虽告知“敝处赠书早经停止”^②,但仍向其通融,寄赠存书。1935年11月11日《致张宋庠》函云:“敝楼出版之书,多数皆未补印齐全,而四方朋好索者纷至,殊苦无以应之。兹奉赠《旧五代史注》壹部,由敝楼直接邮寄,聊备插架,未敢云琼瑶之报也。”^③可以说刘承幹的赠书行为贯穿了整个刊刻生涯,面对各方函索,经济日渐窘迫的刘承幹以售书来代替部分赠书,无疑可以缓解这方面的经济压力。

(二)加价兜售,版片盗印

1931年嘉业堂正式发售自家刻书之前,北平有些书坊就在以高价兜售嘉业堂刻书,据1928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载“《危太朴文续集》(嘉业堂刻) 竹纸六册 洋六元”^④,与嘉业堂1931年版营业书目的定价“三元五角”相比,贵了近一倍。1931年初,刘承幹从谢国桢处得知,嘉业堂刊“梅述《通义堂集》京估竟有索价每部廿元者,殊骇听闻,如有人欲购拙刊,不妨通函直接,免若辈辗转弋利也”^⑤。而三种嘉业堂营业书目均定价为“六元”。刘承幹刻书本意在流通,此类事件或许令他产生了与其让各家书贾加价争利,倒不如自己发行售卖的念头。

除此之外,他委托北平文楷斋侵版的《晋书斟注》,因版片留在北京,久不交还发货,坊间传闻文楷斋有私印偷售一事。刘承幹对此气极又无奈,“刘春生(引者按,即文楷斋主人)殊属可恶,将书板留住,无非私印发售,借以牟利,将来版片损坏漫漶之事,彼则不负责任。专图利己,不顾损

①刘承幹:《致孙虞臣》,《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525页。落款署“五月十号即四月初五日”。

②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271页。落款署“五月十七号即四月十五日”。

③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137—7138页。落款署“十一月十一日即十月十六日”。

④《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1928年,叶二十六。

⑤刘承幹:《复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50页。题下署“三月二日即四月十九号”。

人”^①。其后《致章一山》信说,“侄屡函甘侯(纲斋丈次子,寓京城翠花胡同八号),与之交涉运南,而甘侯置之不理,反与该斋接洽,私自印刷,以致京城中流传甚多,即长者前函所谓有人印刷者,即此事也”^②。刘承幹多次函催刘春生交还版片,又托吴甘侯(即吴潮)与刘春生就近接洽,均无果,不得已请律师出面调停解决^③。其后板片运南过程中,又被天津海关扣留,甚为波折,1931年日记^④载此事较详。

(三) 书坊代售,收款困难

刘承幹也曾尝试与上海几家书坊合作代售书籍。1925年,他与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云:

拙刻遵即检集送上,另账附呈。惟所存无多,每种仅呈一帙以为样本,如销售某集,请即飭人到敝处续取。拙刻现归邹君履冰主持,径与接洽可也。至于报销一层,照西泠印社、扫叶山房、蟬隐庐、博古斋诸家为敝处代销,于午节、中秋报明,七折核算,至年终则结清。明岁此项印本亦归沪上敝建藏书楼办理,故拟出售各书再减一折,均备价现购,先此附闻。^⑤

上海西泠印社虽以售卖印谱、碑帖、印泥闻名,但其在20世纪初实际以各类木刻精印书籍的印刷与寄售代销为主业,而西泠印社在国内如四川、哈尔滨、山东、山西、广东、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绍兴等处均有经售处,甚至远销日本^⑥。扫叶山房更是历史悠久,开设有上海棋盘街、上海彩衣街、汉口、苏州、松江各分号,书店“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徼,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⑦。蟬隐庐、博古斋、中国书店均为沪上古旧书业之佼佼者。刘承幹选择与以上书店合

①刘承幹:《复吴进思》,《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116页。落款署“六月五日即四月二十日”。

②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227页。落款署“八月卅一日即七月十八日”。

③刘承幹:《致吴希眉》,《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282页。落款署“十月十号即八月廿九日”。

④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45—146、150页。亦见于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629页。

⑤刘承幹:《致陈乃乾》,《求恕斋信稿·乙丑(1925年)》,第4175页。题下署“二月八日”。

⑥《戊辰年第二十五期西泠印社书目》书末载“各省经售处”。

⑦1929年《扫叶山房图书汇报》“启事”,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2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作代销刊印书籍,显然是想借重各家发达的售书网络,广开销路。由此函也可得知刘承幹与各家书店代售的基本模式:由刘承幹寄去样本各一部,如有销售,则需书店派人前往刘宅取书,书店以六至七折备价现购,年终再结清售书款项。

北平一些书坊也在零星售卖嘉业堂刻书,如1925年《文奎堂书庄书目》、1928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1929年第一期《来薰阁书目》、1930年《北平直隶书局书目》等多家营业书目中均可见嘉业堂刻书的身影。但从《求恕斋信稿》提供的信息来看,刘承幹与北平这些书店似无通函联络,那么这些书店有可能直接与南浔嘉业藏书楼联系合作,或是由非正规渠道获得印本(如私印),抑或辗转经销如上海西泠印社、扫叶山房等所售书籍。

1929年《嘉业堂善本书影》由蟬隐庐书局预约发售,“吴兴刘翰怡先生藏书至富,其书目尚未刊传,并世学者每以未见为憾。兹先生将所藏宋元精本百数十种,每种各印一二页以及题跋,仿铁琴铜剑楼例,汇为书影一书,委托敝庐代为发行。宣纸精印六册,定价十八元,预约十二元,外加邮费二角一分,旧历九月中出书,即截止预约,用为预告”^①。次年1月登报告示,“凡曾购书影预约者,请即持券取书”^②。蟬隐庐主人罗振常是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周子美的岳丈,与刘氏私交甚好,二人合作还算顺利。因此1931年初,刘承幹“规画寄售办法”^③,“拙刻各编,拟由书楼发交海上各书坊代售,较为便利”^④。但据其后的《致陈绳夫》函可知,计划由书坊代售一事因考虑到往年收账困难而告吹,改由自家发售:

承示愿为拙刊从书推销,极感挚爱之雅。惟弟历年以来所受感触至深且巨,有不得不为执事告者。往者,本外埠各书坊多有自愿代售敝处书籍,弟志在流通,自无不欢迎之理。迨书既配去,而代价不至,即有至者,账终不能结清,如此所见不鲜。捆载而往,垂橐而归,虽富

①《嘉业堂书影发售预约》,《申报》1929年8月24日第9版、26日第3版、28日第7版、30日第3版,9月1日第3版。

②《蟬隐庐十九期旧本书目嘉业堂善本书影出版》,《申报》1930年1月19日第6版、21日第3版、23日第4版、25日第7版。

③刘承幹:《复吴子馨》,《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85页。落款署“二月二十八日即正月十二日”。

④刘承幹:《致许西畴》,《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35页。题下署“二月十日即三月廿八号”。

若陶猗,恐亦难乎为继。是以如惊弓之鸟,不敢轻于尝试。今岁编定价目,有先惠书价之规定。区区苦衷,原非不得已,非敢斤斤于是也。^①

综上,刘承幹刊印书籍志在流通,自行印售嘉业堂刻书虽受到友人建议以及徐松《宋会要》事件影响,但主要出于营利之考虑,以缓解其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应对各方索要赠书的压力。嘉业堂刻书虽然也经由上海等地各大书坊经销代售,但因收款困难,且各家要价多不合理,坊间还有盗印私售之事。在此情形下,刘承幹编制营业书目,订立统一书价,以规范图书销售。

二、三种营业书目的比较分析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是后世了解嘉业堂 20 世纪 30 年代书籍出版和销售活动的重要资料,目前仅发现 1931 年、1935 年、1936 年的三种。对比之下,三个版本各有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此三种均为铅印本,书目由几部丛书、单行本、附影印书以及外埠购书简章等若干部分构成,丛书下按经史子集分类,著录书名、卷数、朝代、责任者、册数以及价格,单行本、影印书同此。《影宋四史》《嘉业堂善本书影》因选用纸张有优劣之分,故而在价格前标明纸别以及对应价格。三个版本又各有不同,且 1931 年版与其余两版差异最大,主要表现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价格的制定,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几个方面。

(一)收录书籍数量

这一部分差异主要源于书目构成部分以及售卖书籍种数的增减,通过表 1、表 2 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表 1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构成对照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嘉业堂丛书》	《嘉业堂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嘉业堂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一百二十元
《吴兴丛书》	《吴兴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吴兴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一百四十元
《求恕斋丛书》	《求恕斋丛书》毛泰纸六开本	《求恕斋丛书》毛泰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七十元

①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373—6374 页。落款署“十二月十五日即十一月初七日”。

续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留余草堂丛书》	《留余草堂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留余草堂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七元
嘉业堂单行本	《嘉业堂金石丛书》	《嘉业堂金石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二十四元
《嘉业堂金石丛书》	《影宋四史》	《影宋四史》
《影宋四史》	单行本 赛连纸六开本	单行本 赛连纸六开本
附影印书	附影印书	附影印书
外埠购书简章	附墨拓本	附寄售书
	附绝版书	外埠购书简章
	附寄售书	
	外埠购书简章	

由表 1 可知,1935 年版内容最多,比 1931 年版多出“附墨拓本”“附绝版书”“附寄售书”三个部分,1936 年版则删去前两部分。

表 2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子目情况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嘉业堂丛书》	55 种 214 册 725 卷	56 种 208 册 695 卷 ^①	57 种 216 册 743 卷
《吴兴丛书》	65 种 236 册 827 卷	65 种 236 册 850 卷	65 种 236 册 850 卷
《求恕斋丛书》	33 种 143 册 233 卷	33 种 143 册 233 卷	33 种 143 册 233 卷
《留余草堂丛书》	10 种 13 册 60 卷	9 种 12 册 61 卷	10 种 13 册 62 卷
嘉业堂单行本	8 种 222 册 607 卷	8 种 222 册 615 卷	10 种 244 册 622 卷
《嘉业堂金石丛书》	4 种 18 册 41 卷	5 种 22 册 50 卷	5 种 22 册 50 卷
《影宋四史》	4 种 140 册 435 卷	4 种 144 册 438 卷	4 种 144 册 438 卷
附影印书	2 种 6/7 册 6 卷	2 种 6/7 册 6 卷	2 种 6/7 册 6 卷
附寄售书		11 种 39 册 126 卷	17 种 52 册 160 卷
附墨拓本		2 种 2 叶	
附绝版书		4 种 48 册 115 卷	

①1935 年版《嘉业堂刊印书目》著录的经部“《礼记正义》残十二卷”条有误字,应为“《礼记正义》残本二卷”(即《嘉业堂丛书》本《礼记正义》卷三、卷四),这里按照订正后的数量统计。

因为嘉业堂刊刻、校对工作是渐次完成的,并非同一时间竣工,因此同一类的子目数量也有增减。由表2可看出,除去《求恕斋丛书》、影印书的种册卷数三版保持一致,其他各子目下数量都有增减,这说明《求恕斋丛书》是丛编中最先竣工的,《吴兴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影宋四史》在1935、1936年版的种册卷数相同,意味着这三部书于1935年完成刊刻,种册卷数其后固定下来。数量变化最大的就是《嘉业堂丛书》,1935年版相较于1931年版缺少《仪礼注疏》一种五十卷,但增加了《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等书的校勘记若干卷,又从《查东山年谱》中析出《东山外纪》单成一种,从《复初斋集外诗文》中析出《翁比部诗钞集》单成一种,1936年又加回《仪礼注疏》一种,因此最后数量为57种。

1935、1936年版书目相较1931年版,增加“附寄售书”一项。寄售书籍多为刘承幹亲友主持刊行的书籍,如《南浔镇志》六十卷为同乡周庆云醵资刊行,《圣学宗传》十八卷为友人聂其杰发起影印,刘承幹捐资助之。《阐义》二十二卷为友人徐乃昌影印,《鸣坚白斋诗存》十二卷《补遗》一卷为友人吴昌硕刊行,《汪文摘谬》一卷由友人叶德辉之子叶启倬铅印出版。又有顺德龙元任《春华集》二卷及其孙龙令宪《五山草堂初编》二卷、孙女龙吟芴《蕉雨轩稿》一卷,以及民国诗人郑霁光的两部诗集:《山色夕阳楼吟草》一卷、《成趣园诗钞》四卷。

1936年寄售书又增加了几部,《南林丛刊》五种十五卷、《洛阳伽蓝记注》五卷、《庄氏史案考》一卷、《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均为原嘉业堂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印行的书籍,《四部寓眼录》亦为周氏主持排印,由蟬隐庐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寄售书中还有一部明张禄辑《词林摘艳》十卷,为钟灵汽压机写印本,亦由蟬隐庐出版。

1935年版书目中有其他两版没有的绝版书4种、墨拓本2种。绝版书有《求恕斋丛书》本《毛诗多识》二卷,单行本《台学统》一百卷、《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太谷山堂集》六卷。其中,《台学统》在1936年归入“单行本”的子目中,其他三书则不见。墨拓本为《文征明楷书辞金记》《文征明行书两桥记》各一叶。

(二) 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

1931年版书目,与1935、1936年两版在书名、卷数、作者著录上差异较大。详见表3(为避免繁复,省去无关信息):

表 3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著录差异表

差异	1931 年版	1935/1936 年版
更改修订题名	闾古古年谱一卷附寅宾录一卷	白耄山人年谱一卷附寅宾录一卷
	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	丰草庵诗集十一卷前集三卷文集三卷宝云诗集七卷禅乐府一卷
	王立甫文集五卷	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
	蛻石文卷一卷	蛻石文钞一卷
增加附题名	尚书正义二十卷 十册 五元	尚书正义二十卷 附校勘记二卷 十册 六元
修订卷数	山子诗钞十卷 二册 八角	山子诗钞十一卷 二册 一元
更改作者信息	同岑集十二卷 明李令哲等撰	同岑集十二卷 明李夏器编
修改著录格式	南唐书注十八卷 祥符周在浚撰十册 五元 附补注十八卷 吴兴刘承幹撰	南唐书注十八卷补注十八卷 宋马令撰 祥符周在浚注 吴兴刘承幹补注 十册 五元四角
多项修改	刑统三十卷 宋佚名撰 四册 四元	重详定刑统三十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 宋宝仪等奉敕撰 附校勘记一卷 六册 四元
	杨见山诗文集八卷附年谱二卷 四册 二元	迟鸿轩诗弃四卷文弃二卷诗续一卷文续一卷补遗二卷附年谱一卷续一卷 四册 一元五角
	周易正义十卷 六册 三元	周易正义十四卷 附校勘记二卷 六册 三元二角

三版书目著录的差异,尤其以更改修订书名为最多,达 20 余处。出现如此多更改修订,一来是各丛编在 1935 年陆续判定完工,因此对 1931 年版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二来可能与书目编制者的变动有关。

1931 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应由当时担任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的周子美负责,这从《求恕斋信稿》刘周二人的信札中可知。1931 年 8 月 10 日刘承幹《致周子美》函云:“楼中新印书目如已印好,请速寄沪数份,因陶兰泉君欲观也。”^①“楼中新印书目”即是 1931 年 7 月印行的《嘉业堂

^①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187 页。落款署“八月十日即六月廿七日”。

刊印书目》。同年 11 月 28 日《致周子美》函说：“铅印嘉业堂刻书目录亦请寄其（引者按，指金陵大学李小缘）一册可也。承示欲用真笔版（引者按，即油印）印书楼目录事，极可行，请照尊意办理为盼。”^①可见，1931 年版营业书目的相关事宜基本由周子美负责。但 1932 年秋，周子美受邀赴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自此便由施韵秋继任藏书楼主任，营业书目的编制自然落在他的身上。1935 年 8 月 4 日，刘承幹《复施韵秋》云，“现当暑假，未识有来观书者否。鄙意此事亦极为难，招待既烦，迎拒两困，此后还是谢绝参观。况书楼各书现事印售，在在须精力为之。闻执事对于印售不辞劳瘁，弟甚感之，故此后拟于售书赢余内提出一成相酬”^②。1935、1936 年嘉业堂印售书籍工作主要由施韵秋主持。三种营业书目分由两人负责编制，加之 1935 年丛书陆续刊竣，前后著录有异，也在情理之中。

（三）价格的制定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作为营业书目，最主要的功能是方便本外埠读者检寻所需书籍，知晓价格，以便汇款函购。三版书目显示书籍价格总体上呈上涨趋势（如图 1 所示），但涨幅不大，有些书籍甚至不升反降，如《嘉业堂金石丛书》中《海东金石苑》一书，1931 年版定价 12 元，1935、1936 年则降价为 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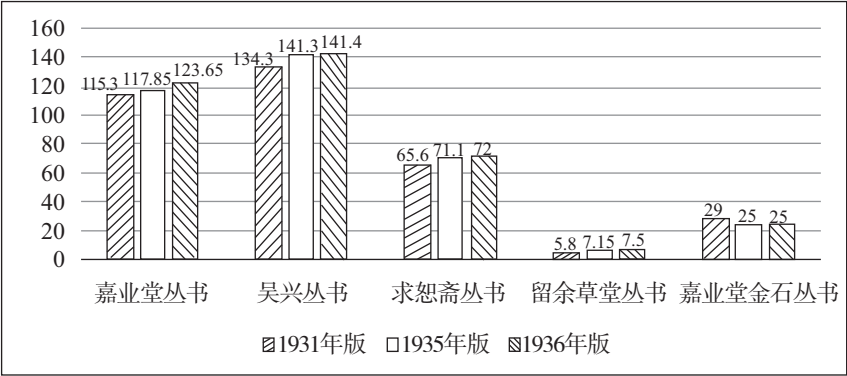


图 1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丛书价目趋势图（单位：银元）

嘉业堂单行本、《影宋四史》因选用纸张有别，价格也各有不同。具体如表 4 所示：

①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346 页。落款署“十一月廿八日即十月十九日”。
②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317 页。题下署“七月六日即八月四号”。

表 4 《影宋四史》与嘉业堂单行本各纸别价目(单位:银元)

书名卷次	纸别	价格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史记》一百三十卷(影宋蜀大字本)	料半	80	70	70
	罗纹	70		
《汉书》一百二十卷(影宋白鹭洲书院本)	料半		100	100
	毛边	45	60	60
	连史	35	60	60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影宋一经堂本)	料半		90	90
	毛边	40	50	50
	连史	30	50	50
《三国志》六十五卷(影宋本)	料半	40	40	40
	罗纹	35		
《晋书斟注》一百三十卷	毛边	60	60	60
	连史			60
《旧五代史笺注》一百五十卷	毛边	24		
	连史		25	25
《台学统》一百卷	赛连	16	16	20
	毛边			25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 附砖录	料半	100	80	80
	赛连	60	50	50
	连史		65	65

书籍价格的制定与纸张息息相关,目前所见嘉业堂刊印书籍所用纸张有宣纸(料半、罗纹),竹纸(毛泰、毛边、连史、赛连),洋纸(洋连)三大类。其中《影宋四史》《八琼室金石补正》《嘉业堂善本书影》等精品皆选用上乘宣纸印制,其他则竹纸、洋纸兼采。选用如此多种纸张印刷的原因有四:其一、手工纸张产量与供应不稳定(如1931年《嘉业堂丛书》用赛连纸印刷,1935年《申报》上的《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则显示将增加连史纸本,1936年版营业书目又减至赛连纸一种);其二,制造价格阶梯,以应市场需求;其三,适应特殊印刷工艺(如《嘉业堂善本书影》为影印之便,选用料半与洋连纸);其四,便于读者批校。刘承幹向李盛铎赠送前后《汉书》时说,“拙刊前后《汉书》,今奉上各一部。弟赠人向用连史

纸印者,但着墨易化,今知执事用功,特奉毛边纸印者,以便丹铅”^①,正出于此等考量。

《影宋四史》一向被视作嘉业堂刻书之最精者,由名盛一时的写工饶星舫影写、刻工陶子麟影刻,印刷所用纸张亦追求精善。仅以影宋《史记》一书(130卷,32册)为例,可知罗纹纸本、料半纸本单册价2.19元或2.5元,单卷价0.54元或0.61元,1935、1936年料半纸本还有降价。可与之作比较的是贵池刘世珩据宋百衲本影刻的《史记》一百三十卷(24册),亦出自饶、陶二人之手。刘世珩编定《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中,书价按纸别分为三档:杭连本20元,宣纸本28元,赛连本14元^②。其中宣纸本单册价为1.167元,单卷价0.215元。据此目序言“溯自弱冠,以迄于今,垂二十稔,无日不与丹黄梨枣为缘”,推知此目编于1915年^③。若以单卷价来看,刘承幹影宋《史记》的价格是刘世珩影宋本的2.5倍强^④,可见十几年间纸料印工价格之腾升。

刘承幹在图书定价方面总体较为公允,这一点从赵明诚《金石录》的定价变迁中可见一斑。该书原为朱氏结一庐所刊,收录在《结一庐剩余丛书》中,1912年刘承幹购得结一庐书板后将其纳入《嘉业堂丛书》。对比不同时期该书的售价:1929年《来薰阁书目》所载结一庐《剩余丛书》本《金石录》的售价为“四元”^⑤,而1931年版嘉业堂营业书目仅定价为“二元八角”^⑥。1935、1936年虽微调至“三元二角”^⑦,涨幅仍属合理。同期北平群玉斋、宏远堂销售嘉业堂版《金石录》均标价“四元”^⑧。再参照前文所述《危太朴文续集》《通义堂集》在北平书坊的溢价情况,都可见

①刘承幹:《致李木公》,《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247页。落款署“九月十五日即八月初四日”。

②《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民国间刻本,叶四。

③刘世珩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依据序言所提“弱冠”迄今二十年,推知此目编定在刘氏40岁,即1915年。

④料半、罗纹均为宣纸之一种,价格各有不同,但差异不大。《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未详细标明宣纸的具体品种,此处比较暂且将三种纸张视为同一品种。

⑤《来薰阁书目(第一期)》,1929年,叶四十八。

⑥《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辛未七月订)》,第4页。

⑦《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乙亥重订)》,第4页。《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丙子重印)》,第4页。

⑧《群玉斋书目(第一期)》,1936年,第102页。《宏远堂书目》,1937年,第204页。

刘承幹定价之公道。

(四)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

民国时期,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出版商则利用网点广布、可直达个人的邮政系统,建立起邮购发行系统,读者可通过报纸广告、营业书目等渠道获得图书信息,有购书意向者可直接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版商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这种便捷、高效的购书方式促使邮购成为民国时期图书发行的主要方式之一,仅次于书店发行。刘承幹售书则邮购与门市发售并行,而以邮购为主。1931年版“外埠购书简章”首先注明各书纸别,规定折扣为七折,标明合购书项,说明函购方法、寄款方式以及运费,最后附发售处地址。

1935、1936年两版与1931年版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纸张的说明、折扣、邮费、发售处地址的变化。1935、1936年版均省去了纸张说明,改在丛书名后直接附纸张类别;折扣则由七折改为八折发售;删去合购书,邮费由1931年的每书十册约二角二分涨为二角三分;并因1934年底爱文义路八十四号刘宅被抵押,改为仅在浙江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印行部发售。

三、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考察

1931年,嘉业堂将发售处一设在上海刘承幹爱文义路的自家住宅,一设在南浔嘉业藏书楼内。1934年5月5日、7日,鲁迅两次前往刘宅购书而不获,以致发出“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①的感叹。1935、1936年,嘉业堂发售处仅设在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内,只在一处门市发售,那么,身处南浔镇以外的购书者如何买书呢?当时的报刊以及刘承幹与多人的通信可为考察1931—1936年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提供若干线索。

(一)免费赠送书目,招揽生意

1931年7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印好后,刘承幹便开始大量向亲友分赠,以作推广。据1931—1936年《求恕斋信稿》所载,赠送刊印书目的对象有陶兰泉、金息侯、孙虞臣、丁仲祐、陈绳夫、谢国桢、章一山、刘湖涵、荣叔章等亲友以及关心国学之士。如,1931年8月13日《致陶兰泉》函云:

承询拙刊书目,前已函致书楼,嘱即检寄来沪。此种目录系近来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

付印者,书楼寄到无多,兹特奉上一册,聊备浏览,并希教正。^①

1935年10月28日刘承幹《致荣叔章》函云:

前承海言,有集款订印拙刻丛书之意,附呈目录四册,借备翻阅。

如承惠订,价格当特别通融,以副惓惓之意。^②

除个人外,刘承幹还积极向图书馆、高校等文化机构赠送刊印书目,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李小缘)、河南官书局(刘怡宣)以及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锺岷云)等。如,1935年11月17日《致锺岷云》函云:

承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庋藏汉文图书极夥,索阅敝楼出版目录,兹特寄呈五册,以备分送。^③

(二)纸张购买困难,续印延期

嘉业堂第一次销售刊刻书籍,贩卖的基本是初印留存的各种复本,存书不多。1931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虽然开列各种丛书价目,实际上很难购得丛书全本,这是因为很多书籍在首次刊印后就已赠送完毕,“拙刊各书去岁曾定一目,但内有多种自出版之后早已赠罄,必待重印”^④。1931年10月23日刘承幹《致陈绳夫》函中说道:“《严州金石志》敝处业已刊成。至各种丛书,现正加以整理,印成全份,恐尚需时日也。”11月8日又说,“拙刊丛书中有多种均未续印”^⑤。之后,刘承幹先后对陶兰泉、孙虞臣等人表示刊行书籍“多种均无存书”“未必续印”^⑥,这也说明嘉业堂第一次贩卖书籍因印量不多,大部分书籍陆续售罄,而各方纷纷来函索书订购。至1933年时,刘承幹苦于无纸可印:

承询拙刊《校经室文集》,此书旧时所印,索者纷繁,致早告罄,久拟重印……而后闽赣产纸各区都已歇业,纸价日昂,几于无处订

①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193页。落款署“八月十三日即六月三十日”。

②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122页。落款署“十月廿八号即十月初二日”。

③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145—7146页。落款署“十一月十七号即十月二十二日”。

④刘承幹:《致章一山》,《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640页。落款署“十月十号即九月十一日”。

⑤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296、6311页。落款分别署“十月廿三日即九月十三日”、“十一月八日即九月廿九日”。

⑥刘承幹:《致陶兰泉》、《致孙虞臣》,《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315、6405页。落款分别署“十一月十号即十月初一日”、“一月七日即十一月三十日”。

购。拙刻《嘉业》《吴兴》《求恕》丛书次第结束,欲付印订,苦于无纸供应,他日或购洋纸印之,则又苦求者嫌纸劣耳。^①

1934年5月5日、7日,鲁迅两次前往上海刘宅购买嘉业堂刻书而不获,第一次没找对地方,第二次因账房不在而未能购买。实际上,即便他找对了地址,见到账房先生也未必能顺利买书,因为此时嘉业堂仍处于购纸困难、续印无期、久无存书的状态。所幸这一窘境在一周后得到缓解,嘉业堂开始陆续添印,准备出售。此据1934年5月13日刘承幹函可知:

承示贵友欲购拙刊《晋书斟注》《雪桥诗话》《海东金石苑》三种,《斟注》初印只数十部,早无存书,今正在添印,约两月后可以出书。《诗话》只存一、二、三集,其余集亦待重印。《金石苑》尚有存书,应否将有存书者先行检奉,抑俟印齐统寄,候示遵行。书目一册附呈台览。^②

(三)登报刊载特价、预约广告

随着纸张供应问题的解决,嘉业堂续印工作开始,但新印书籍数量有限。1934年6月2日、4日、6日刘承幹在《申报》上连续登载《嘉业藏书楼特价书》广告,发布了6种特价书的发售信息(如表5所示),同时宣布特价期定在当年六月。特价书表前附购书启事一则,告示购书折扣从原来的七折变为八折,停止函索书目,需附邮寄送,并停止上海刘宅的嘉业堂刊刻书籍发行,只在南浔嘉业楼售卖。

表5 嘉业藏书楼特价书表

书名	纸别	册数	定价	特价	邮费
景宋史记	料半	32	80元	48元	1元4角
景宋两汉书	毛边	92	85元	50元	3元
	连史		65元	40元	2元4角
校正晋书斟注	毛边	60	60元	36元	1元7角
	料半		100元	70元	2元3角

①刘承幹:《复顾鼎梅》,《求恕斋信稿·癸酉(1933年)》,第6760—6761页。题下署“二月廿六日即三月廿一号”。

②刘承幹:《致谢刚主》,《求恕斋信稿·甲戌(1934年)》,第6994页。落款署“五月十三号即四月初一日”。

续表

书名	纸别	册数	定价	特价	邮费
八 琮 室 金 石 补 正	连史	64	80 元	56 元	1 元 4 角
	赛连		60 元	42 元	1 元
台学统	毛边	40	25 元	17 元	1 元
	赛连		20 元	14 元	8 角
嘉业堂书影	料半	6	14 元	8 元	2 角 5 分
	洋连	5	7 元	4 元	1 角 7 分

1935 年 5 月 1 日,刘承幹又在《申报》上登载《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说道:“本丛书都五十六种七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册。嘉业主人收藏既富,辑刻极精,惟二十年来随刊随印,得者每以不能配成完帙为憾。兹将全书汇印发售,预约简章列后。书印无多,惠购从速。”^①

民国时期大部头古籍的出版多采用预约发售的营销策略,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在正式发售前,先行预约,这样可以提前回笼资金,按照预约数量付印,以达到节约成本、获利最丰之目的。以上特价、预约广告等图书推广手段显然卓有成效,新印书籍很快便供不应求:“各书间有告罄,又值发售预约,供不敷求。”^②

(四)沪浔两地经营,专人负责

据《求恕斋信稿》,嘉业堂刻书的印售事务先后由邹履冰、周子美、施韵秋三人主持。其中,邹履冰主要负责刘承幹在沪藏书的管理与图书收发销售事宜。如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叶卫曾来函索《台学统》一书,刘承幹便写信给邹氏说,“弟忆架上尚有是书,乞即检出,径寄海门”^③。刘承幹与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中也明确表示过:“拙刻现归邹君履冰主持,径与接洽可也。”^④由此可知沪上各书店代售嘉业堂刻书时,主要与

①《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申报》1935 年 5 月 1 日第 7 版、7 日第 4 版、13 日第 2 版、19 日第 4 版、25 日第 4 版、30 日第 4 版、6 月 6 日第 4 版、12 日第 4 版、18 日第 4 版、24 日第 1 版。

②刘承幹:《致蔡奎农》,《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271 页。落款署“五月十七号即四月十五日”。

③刘承幹:《致邹履冰》,《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033 页。题下署“二月八日即三月廿七日”。

④刘承幹:《致陈乃乾》,《求恕斋信稿·乙丑》,第 4175 页。题下署“二月八日”。

邹履冰接洽取书、收账等事宜。直至1935年初,因邹履冰骗走五万元巨款^①,刘承幹将其开除,改派账房先生程伯厚接管收账事务^②。

南浔方面,1932年秋周子美离开嘉业堂后,藏书楼事务主要由施韵秋负责。施韵秋在嘉业堂重启印售之前,实际还在经理《四明丛书》的刊印工作。1933年的《四明丛书出版通告》中将总发行处设在“本埠大西路光华大学《半月刊》社及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③,刘承幹也说过“《四明丛书》事向由施君韵秋一手经理,此间全不过问”^④。1935年夏,嘉业藏书楼人事发生变动:原书楼会计王建夫去世,由崔叔荣继任。原保婴会助理张仲翱转入藏书楼,专司编查、抄寄、收发等事务。刘承幹《复施韵秋》函中特别说明“令亲仲翱兄在楼有年,细心从事,足资倚助。因念值此时艰,保婴捐款恐难持久……故仲翱兄保婴助理一席特予取消,此后专在书楼办理编查、钞写、收发事宜,月薪十二元,俾免分心而专一楼事”^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施韵秋的月薪为三十元,刘承幹本欲为其加薪,但因财务紧缩,遂提议以售书盈余一成作为酬劳。施韵秋体恤刘承幹经济紧张,屡次婉拒。刘承幹感动之余,在信中恳切陈情说:“伏念阁下对于书楼,苦心孤诣,本以此刻规定职务,于执事一方,论理须酌加薪水,以酬其劳。无如敝处一切正在减缩之秋,故有酌提售书赢余为薄酬之计。乃阁下转欲自请减薪,令人惭汗无地。在阁下为节省开销之计,出自真诚,此则万无是理。昔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我公幸勿再谦,为弟稍留地步。至于书余酬劳,我公欲推让同人,此区区者,稊米杯水,微乎其微,似可不必。况在楼诸君准情酌理,虽不甚丰,亦不过薄。此弟贸然,仍以伯玉之言责之,君子幸安之若素,勿更谦谦。”^⑥

①刘承幹:《致董授经》,《求恕斋信稿·甲戌》,第7095页。落款署“二月一号即十二月廿八日”。

②刘承幹:《致金颂清》,《求恕斋信稿·甲戌》,第7213页。落款署“一月廿九号即十二月廿五日”。

③《四明丛书出版通告》,《申报》1933年2月20日第4版、3月12日第6版。

④刘承幹:《致周星三》,《求恕斋信稿·甲戌》,第6958页。落款署“三月十二号即正月廿七日”。

⑤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316—7317页。题下署“七月六日即八月四号”。

⑥刘承幹:《复施韵秋》,《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320页。题下署“七月十九日即八月十七号”。

(五)偏重整售业务,兼顾零售

目前1931—1936年间《求恕斋信稿》中可查的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最早见于刘承幹与当时在北平图书馆供职的谢国桢之间的通信。谢国桢为北平图书馆向刘承幹函询购书事宜,1931年2月26日刘承幹回复云:

拙刊聊供学者检阅,昔人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拙刊虽剞劂未精,大都皆古人著述,藏之贵馆胜于名山万万矣。^①

后谢国桢向刘承幹寄去194元大洋,开单购书。刘承幹此时在南浔,而书籍大多在上海,因此回复到:

承汇寄洋一百九十四元,如数察入。惟拙刊大都在沪,若者有,若者无,若者何价,此间未能核实。好在浔居已久,转瞬出申,到后当照来单检集,寄奉台端分致也。现存书目以丛书尚未修竣,书目亦未印成,一俟印出,再当寄上。^②

1931年5月10日,书籍已照单配好,分装37包寄去北平,刘承幹函云:

承代手各书,今已囑典守者配好,分为三十七包,交邮寄上,到请察收。^③

5月15日,又函云:

曾上一笺,并邮寄拙刊三十七包,又《历代诗话》壹部,谅达典签。兹附上清帐十纸,请台核揭。余洋壹元七角式分五厘,因零星邮汇不便,暂存敝处。^④

以上函件可以大致复原刘承幹售书的基本流程,即购书者函询开单,寄来汇款,嘉业堂照单检书,分装邮寄,并附清单,零星余款则暂存嘉业堂。刘承幹的另一通信函则反映了余款的其他处理方式:

浦江清、王以中两先生订购各书,今已照单检出,交邮寄上。惟《雪桥诗话》,只有二、三两集,其初集及余集均无存书,今附上一账,敬希台察。余洋陆元八角四分,应否汇还,抑另购他书,尚祈示知。

①刘承幹:《复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72页。落款署“二月二十六日即正月初十日”。

②刘承幹:《复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50页。题下署“三月二日即四月十九号”。

③刘承幹:《致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94页。落款署“五月十日即三月二十三日”。

④刘承幹:《致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099页。落款署“五月十五日即三月廿八日”。

又蒙示上年余洋拟购《传经室集》，但此书早经告罄，其洋应否一并汇还？均祈示遵。^①

除北平图书馆外，《求恕斋信稿》中尚见有中山大学（石光瑛）^②、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③、东方图书馆^④意欲购买嘉业堂刊印书籍。1936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订购部汇报工作中提到，“普通书中以丛书及大部书为要，如南浔刘承幹之《嘉业堂丛书》《求恕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等，悉数补全”^⑤。1936年版《嘉业堂刊印书目》还特意增加销售价格，都说明比起零售，嘉业堂售书更趋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

（六）仍与书坊合作，经销代售

1931年前刘承幹已与上海多家书店合作销售嘉业堂刻书，考虑到收款困难，而改代售为自家发行。但或许出于宣传推广之目的，仍保持与中国书店、蟬隐庐等书店的合作，同时北平等地书店也有售卖嘉业堂刻书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刘氏嘉业堂刻书可见于1932—1937年《来薰阁书目》，1931—1934年《受古书店旧书目》，1931—1937年《文奎堂书庄书目》，1934—1937年《修绠堂书目》，1935、1936年《邃雅斋书目》，1936、1937年《稽古堂书目》，1936年《松筠阁国学书目》，1936年《宝铭堂书目》，1936年《群玉斋书目》，1936年《德友堂书籍目》，1934—1936年《中国书店新旧书目》，1935—1937年《蟬隐庐旧本书目》，1935、1936年《复初斋书局书目》等北平、上海、杭州各大书店营业书目。蟬隐庐的营业书目中专辟一节附录“代售南浔刘氏所刻各书”^⑥。除上海蟬隐庐、北平群玉斋、北平德友堂等整售嘉业堂刻书的，其余书店所售多零散不全，有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获得。

①刘承幹：《致谢刚主》，《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457页。落款署“二月廿九日即正月廿四日”。

②刘承幹：《致石林谦》，《求恕斋信稿·癸酉》，第6859页。落款署“九月一号即七月十二日”。

③刘承幹：《致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求恕斋信稿·甲戌》，第6951页。落款署“三月五号即正月二十日”。

④刘承幹：《致龙榆生》，《求恕斋信稿·甲戌》，第6963页。落款署“三月廿一号即二月初七日”。

⑤《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九年刊》，国学图书馆，1936年，第24页。

⑥《蟬隐庐旧本书目（第二十八期）》，1936年，叶五十九至六十。《蟬隐庐旧本书目（第三十期）》，1937年，叶六十四至六十五。

虽然书籍远销多地,收款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1935年12月1日,刘承幹致信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云:

往岁宝号向敝楼批发出版各书,均由爱文义路敝寓管书人经手。

嗣因管书人开除,弟又迁居离沪,故迄未结帐。兹嘱敝帐友程伯厚兄诣前,敬祈检出从前取书凭折,结算清楚,至为感荷。^①

然而,金颂清并未按期付款结账,刘承幹无奈又去信一封,提出以书划账,了结此事:

上月为书帐事曾布一笺,嘱敝帐友程君诣前,当蒙宝号检出货折结算,计洋九十八元,允于阳历年底汇苏,乃届期未见汇寄。旋见报载宝号新出《廉价书目》,当函索一册,翻阅之余,中有一为敝处需用之书多种。因思以书划帐,亦是两便之法。用敢开上一单,嘱敝帐友沈君衡之向宝号接洽。如蒙俯允,请将各书检交沈君带回。至于折扣一节,书目封面载明廉价期内照码八折,寄售书九折。今拟援同行交易旧例,再打一折码洋七折,寄售书八折。久忝雅故,想荷台许。^②

(七)通过函件沟通,熟人代购

至此,已大致勾勒出嘉业堂售书的基本情况。因嘉业堂各丛书刊竣时间不同,刊行后又多赠书,欲购时未必有存书;又因纸张难觅,纸价日昂,印刷数量有限,丛书全本往往需要先行预约付款,才能购得。不论上海、南浔或是外埠购书者,都需要先致函刘承幹或南浔嘉业堂询问是否有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购买。因笔者尚未见到南浔嘉业堂的销售账簿或信札,目前仅据《求恕斋信稿》所载知,刘承幹售书基本依托熟人社交网络来实现,与刘承幹不相识的人想要购书,多托友人代为介绍购买。

如1932年4月14日刘承幹函云:

拙刊各书虽有一二百种,然内有多种自初印告罄之后,迄未续印。梓生观察欲为介绍,未知需何种,便祈示知,以便检寻……承索拙刊零种,敬祈举目以示,如架上有存书,当奉上不误。^③

①刘承幹:《致金颂清》,《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164—7165页。落款署“十二月一号即十一月初六日”。

②刘承幹:《致金颂清》,《求恕斋信稿·乙亥》,第7213—7214页。落款署“一月十九号即十二月廿五日”。

③刘承幹:《致孙虞臣》,《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501—6502页。落款署“四月十四号即三月初九日”。

1932年12月17日函云：

承询拙刻《四库表文笺证》，询之书楼，甫经续印，新价未定，仍照旧价，计四册洋壹元貳角，以七折核算，即希转致贵友为荷……贵友如果欲购，即请就近函致沪寓也……弟并非谋利，不过收偿纸本而已。^①

1934年6月16日函云：

贵友购拙刊《晋书斟注》今已由浔寄到，请转告持条至敝寓一取为感。^②

以上例子表明，刘承幹售书（嘉业藏书楼印行部的销售情况或有所不同）既不同于开门迎客式的书店经营，又与各大书局、书坊大批量刊印发行模式有所差别。刘承幹后期因资金困难，刻书印数有限，虽发行营业书目以便购者拣选，但购者却不能根据书目直接购买，仍须通函咨询是否有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这种需要函件往来、多费周章的购书模式无形中增加了购书门槛，因此目前所见刘承幹售书基本需要有熟人引荐。鲁迅因与刘承幹素不相识，两次前往刘宅购书而不获，最后托友人张梓生从刘承幹处购得所需书籍^③，也为一例佐证。此外，购书者、介绍人与刘承幹的关系亦有远近亲疏之分，关系亲近者购书或介绍购书，如果金额较少，刘承幹时常转卖为赠，如1932年7月31日《致张菊生》函云：“承介汪憬吾大令欲索《晋书》，敝架只剩一部，即以奉贻。大令志节，侄素钦佩，重以长者介绍，书价万不敢领。”^④

四、结语

通过对《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背景的考察和1931、1935、1936年版书目内容的对比分析可知，嘉业堂刊印销售活动，实为刘承幹在经济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要赠书、减轻经济压力而采取的营利举措。三种营业书目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之手，加之嘉业堂各丛书

①刘承幹：《复顾鼎梅》，《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685页。题下署“十一月二十日即十二月十七号”。

②刘承幹：《致叶柏皋》，《求恕斋信稿·甲戌》，第7007页。落款署“六月十六号即五月初五日”。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鲁迅日记》，第178页。

④刘承幹：《求恕斋信稿·壬申》，第6577页。落款署“七月卅一号即六月廿八日”。

渐次竣工,故 1931 年版与后两版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次、作者的著录,价格的制定以及外埠购书简章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销售推广方面,刘承幹采取了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既向多位亲友免费分发营业书目,又在报纸登载特价、预约广告;既接受邮购订单(此为销售主要渠道),又开设沪浔两地门市。具体运作上,1935 年前由邹履冰负责上海地区的销售,南浔则由周子美、施韵秋先后主理。刘承幹虽偏向大宗整售,亦兼顾零售,对熟人少量购书常转为赠予。虽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但以中国书店一家为例就可窥见,寄售书籍收款甚难。

刘承幹虽为民国时期最为守旧的一派,在图书营销上却颇为“趋新”:登报广告、特价促销、预约发售、营业书目无一不是当时沪上流行的新式图书销售手段。这种传统古籍出版与现代营销方式的奇妙结合,构成了民国出版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民国私家刻书的代表,刘承幹的售书实践不仅反映了民国古籍出版的真实商业生态,更为我们考察传统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珍贵案例。

本文初稿承蒙复旦大学李飞等学友指正,二稿曾于“图书馆、藏书家、书商: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会议(2024 年 9 月 7 日,上海)宣读。又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惠赐修订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袁静,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民国藏书史,古籍保护与研究。